

寻找建筑中的现代中国理想

——张开济建筑思想与作品学术研讨会

Searching for the Ideal of Modern China Through Architecture:
Symposium on the Thought and Work of ZHANG Kaiji

马国馨 等 | MA Guoxin et al.

中图分类号: TU-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3) 03-0051-18

DOI: 10.12285/jzs.20230530006



参加研讨嘉宾合影 (部分嘉宾线上)

时间: 2022 年 10 月 24 日

地点: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C200
会议室

主办: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建筑师》
杂志社

研讨背景:

张开济先生 (1912—2006) 是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中的代表性人物, 1935 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 1950 年代主持设计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办公大楼群、百万庄居住区等国家级重要项目, 获得首批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是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的获得者。

2022 年是张开济先生诞辰 110 周年,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张开济先生家人以及建筑学界、出版界各方的支持和推动下, 由学者程力真老师所著的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张开济大师建筑思想与实践的专著——《建筑师张开济》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为了缅怀和纪念张开济先生, 深入研究张开济先生的建筑思想与设计成就, 同时加深和推动对以张开济为代表的同时代建筑师相关群体的研究, 特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了“寻找建筑中的现代中国理想——张开济建筑思想与作品学术研讨会”, 研讨由《建筑师

张开济》一书责任编辑、《建筑师》杂志副主编易娜主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邵韦平与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陆新之出席本次学术研讨会并致辞。研讨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1) 所学与所思：张开济建筑求学、执业历程与建筑思想的相互关系；2) 所作与所为：张开济建筑设计作品形式、语言、建造技术与时代特征等；3) 关于张开济同时代建筑师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研究的探索与思考。学者与专家们围绕以上几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文将与会者发言扼要整理，以呈现本次研讨会的全貌。

研讨嘉宾（按姓氏笔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马国馨 |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

叶依谦 |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

伍江 | 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

刘亦师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韦平 |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张永和 | 张开济之子，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非常建筑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杨昌鸣 |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浩 | 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鸽 |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建筑师》杂志主编

陆新之 |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

张路峰 | 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卫钧 |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单踊 |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磊 |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建筑评论》两刊主编

易娜 | 《建筑师》杂志副主编，《建筑师张开济》责任编辑

徐苏斌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彤 |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程力真 |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建筑系副教授，新书《建筑师张开济》作者

戴路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邵韦平：我今年已经过了六十岁，是今天到场的建筑师里面年龄最长的人了。非常荣幸的是，我的工作历程中一直跟张开济老先生有交集，虽然这种交集很有限。印象比较深的有：中日建筑师1997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人民大会堂设计与建设”研讨会，还有1999年在北京召开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我都近距离地接触到张老，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知道北京开国十大建筑“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是由张老先生亲自主持设计的，这个项目代表了他职业成就的高峰，当年因为这个项目的改造，业主在2000年后专门举办了一次国际方案招标，我们那时候是和英国的诺曼·福斯特建筑事务所合作，参与了革命历史博物馆扩建工程的方案征集，在过程中专门向张老当面请教，老先生特别提到有关当年的“十大建筑”创作时的感受，尤其是当年这个项目在如何传承中国文化，以及如何将中国传统建筑 and 现代功能需求相结合方面有很多思考。他说觉得当时那个项目做得有点矮了，所以老先生很支持项目的改扩建，这样可以让革命历史博物馆更具有气势。

很荣幸因为得到张老当面的一些教诲。最近为建党100周年专门创作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时候，我们又深入研究了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些当年的创作手法与思想，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有关让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现代化的手法，比如说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柱廊是用方柱子，然后通过额枋

和柱子之间通过侧向连接，这些东西都是传承了木构建筑的这样一种逻辑，这些让我感受到那代建筑师所具有的独特和高深专业修养，也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我们为有这样一个前辈感到由衷的自豪。

2018年初，跟张永和先生一起在四川成都参加一个建筑文化颁奖活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说我是来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在座的张永的父亲——张开济先生就是我的前前任，我很荣幸能够作为张老的后辈从事建筑师这个职业，我们也希望通过《建筑师张开济》这本书的出版，能够让后人更多地了解前辈的设计心路，以及为中国现代建筑发展做出的贡献。去年建筑界还举办过多场纪念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活动，概括起来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性和开拓性，探索现代建筑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中国建筑的现代化。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也希望借这个活动能够把北京院更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记录下来。再次感谢专著的作者和做出贡献的各位学者。最后祝今天学术活动圆满成功！

张永和：作为建筑师，我对父亲的工作里面有几件事儿感兴趣，但是也没有很深入地去。像“低层或多层高密度”的概念，它既是关于集合住宅的，又是关于城市的。有一位老师曾经对我说，“你是实践建筑师，你怎么让年轻人也对（19）50年代的建筑发生兴趣？”因为1950年代的中国建筑其实是我近年来非常感兴趣的，是超越“主义”的现代建筑。

我讲的是那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他们做的工作不是像原来我们以为的有一个清晰的或绝对的“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分。他们做的工作，是在寻找建筑的一种现代性。这也是程老师书里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就超越了不同的主义或者风格。

我父亲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在一个大语境里的个案。在谈他之前，我想提一篇文

章，这篇文章是东南大学童明教授写的，题目是《学院传统与专业因素》，发表在《建筑学报》上。这里的“学院”是特定的，他谈的是巴黎美术学院，说的是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并不是被约束在一个风格里面的，而是这个传统里的一系列思维方式，包括技巧等，实际上都是建筑学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古典主义建筑里可以用这些知识、技巧和思想方法，在现代建筑中也可以用。就是说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构成了建筑学的专业因素或核心知识。在这么一个建筑学框架下来看我父亲这代人所做的工作。我父亲念书的学校，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也是我和在座的有些老师比如单踊老师的母校。我和单踊老师是77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校时的校名叫“南京工学院”。这是我父亲画的水彩写生，建筑当然是“所谓”的古典建筑，巴黎美术学院式的建筑教育里面不可或缺的一课就是画水彩。古典建筑也不是能简单地定义的。比如这个名人纪念堂，这是1934年他念三年级时的作业，他已经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古典建筑进行简化。我猜他参考了一个新建筑，就是当时美国的林肯纪念堂。坡顶端部的三角山墙没有了，它变成了一个更简单的几何形体，然后装饰也尽量去掉了。所以它显然是古典主义的，但同时又开始向现代迈出了第一步（图1）。

这就回到童明老师提到一个主题，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专业因素。严格说起来这并

不是巴黎美术学院的老师做的工作，而是巴黎技术学院的一位老师迪朗作出的贡献。迪朗教授已经能运用抽象思维，把各式各样的建筑平面的“定式”（法文叫parti）总结出来。这些定式可以拉起来一个古典的庙宇，但也可以拉起来一个现代的剧场。这种平面定式，是对空间组织的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它导致建筑设计的开始并不是所谓要建立一个原创的空间组织，而是选择一个既有的空间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在今天再重新思考的问题。现在常常在现代主义思维影响下，好像建筑师可能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设计或者是平面，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非常难得，更多的也是选择。这是迪朗书里面的一页，他把各式各样的“定式”罗列出来。定式这个词是我从围棋里借来的。因为下围棋的时候，最先走的那几步都不是要想的，而是要背下来用。双方都按先人的“定式”走，造成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平衡局面。只要两方没有一方出错，平衡是可以保持的，这种思想方法跟马上去进攻，马上就去厮打，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我父亲设计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他先选择了一个定式作它的平面基础，形成建筑东西对称；然而他要把对称性贯彻到底，这个建筑有两个入口，一个在南面轴线上，一个在东面，做到东立面以及进去入口内的门厅空间也要完全是对称的。这需要很高的空间组织技巧。立面上看，体量比较简单，同时又把中国建

筑的一些装饰运用到三开间的柱廊上，比如像雀替这种因素。这种浮雕其实跟希腊神庙上的是类似的，只不过内容变成中国的了，变成现代的了，已是简化的中化的古典。现在这里是协和医院的院史馆（图2）。

下面就是从简化的古典再转化的问题了，咱们已经看到一点点了。要转化中国古典建筑传统，首先要面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挑战，城市密度的增长。以前四合院和胡同构成的北京肌理是一层的，后面盖的这些住宅，就再也不可能是一层的了。在1950年代，低的是二三层的，高的有四五层的。同时像“四部一会”这么大体量的办公建筑群，历史上也没有，它是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都是过去不存在的。我学建筑之后，听我父亲讲过，设计“四部一会”这么一个大楼，又要让它跟中国古典建筑传统发生关系，非常不容易，并没有做熟的“套路”。他是看到古代城门楼受了很大的启发。这个转化不是很直接，但又是显而易见的。城门楼变成一个五六层办公楼，一个多层甚至高层现代建筑就有了一个在中国古典建筑里的参考依据。

这个平面是北京百万庄小区，采用“双边式布局”，双边式的布局跟院落有很大关系。“乾隆京城全图”中胡同和四合院构成的肌理，跟百万庄的肌理是很不一样的，但是百万庄仍然保持了一种城市尺度上的院落，还是借鉴了老北京四合院的肌理。用古代城市空间结构启发现代城市设计，来解决1950年代中国城市的密度增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参考（图3）。

我父亲其实也做过现代建筑，但有意思的是并不纯粹，它有古典的特征。这是他做的一个纪念碑设计的竞赛方案，是第二名。这种简洁的造型，纯粹的圆球形，就很现代了。但是这四根支撑体越到下面越宽出来，表现了力的传递，比较不抽象，实际上又更像古典主义的方法（图4）。

就是说在那一代建筑师的脑子里，像杨廷宝先生，华揽洪先生等，并没有很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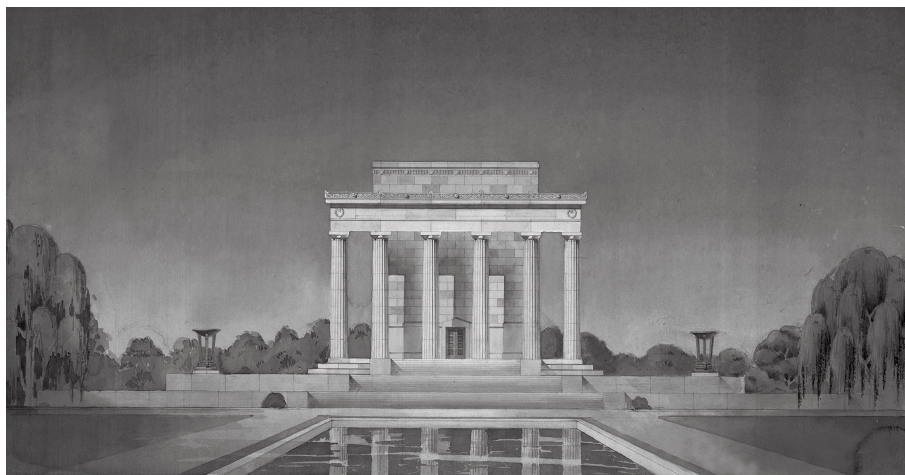


图1：张开济国立中央大学就读期间三年级作业：名人纪念堂（1934年）

条地去纠结一些风格和主义的问题，而是很开放，把他们掌握的知识及对建筑的理解，恰当地进行“混搭”，再进一步去设计跟城市发生融合的建筑，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比较“当代”了。

因为在“现代”时期，常常是把建筑作为城市里孤立的物体，建筑和建筑之间没有很紧密的关系，反而古典城市里以街区形成肌理。几乎从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城市都有这种记忆：整个一座城市就是一个

建筑。我父亲做的天安门观礼台，也是把一个新建筑非常好地插入到现有的城市关系里。实际上它构成故宫这道城墙的一部分，同时它的使用又是参与前面广场上的活动，所以就开始富有当代性了。从天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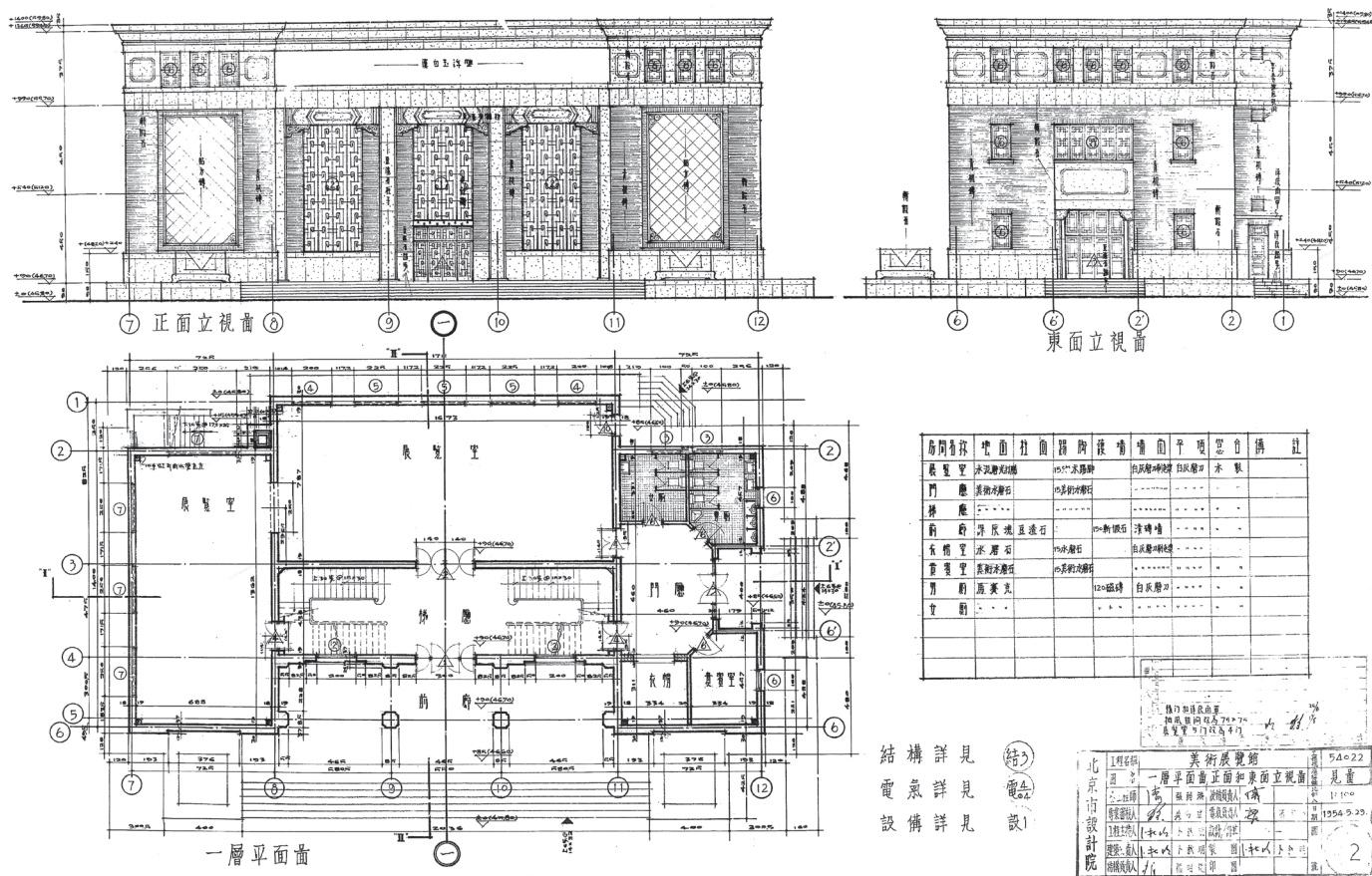


图2：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图纸（195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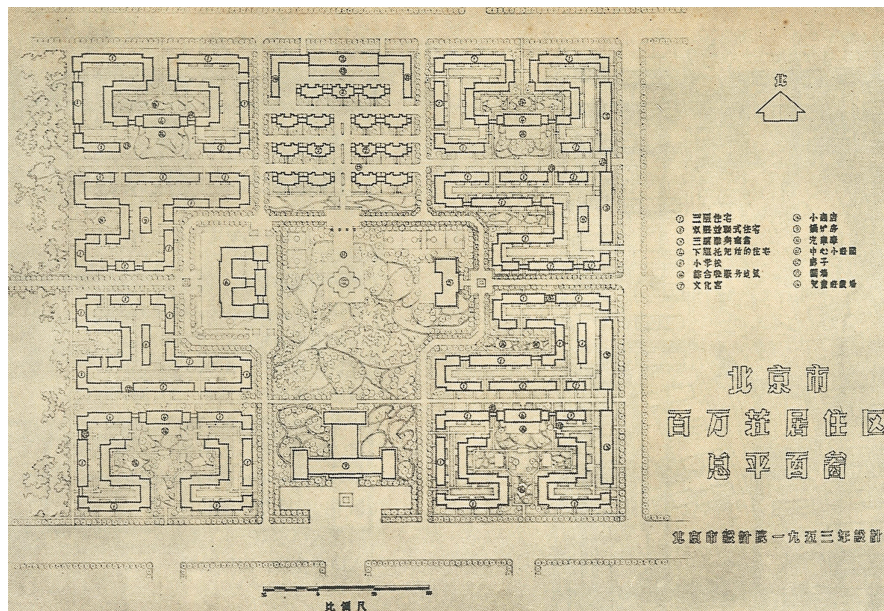


图3：北京百万庄住宅区“双周边”规划总平面（1953年）



图4：沈阳开国纪念碑设计竞赛第2名（1950年）

门广场角度看观礼台，是简洁干净的，完全没有古典主义的特征，尽管在观景台北侧有一些拱券的做法。1950年代有很多建筑师，比如我前面没有提到的林克明等，当时都在做着类似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特别有意义，它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如果拘泥于某一个风格就常常变成假古董或者变成了一个很突兀的现代建筑。

我今天发言的核心观点是不要把一位中国建筑师的工作孤立地去对待。现在非常重要地是要建立起一个中国建筑师的谱系，每代建筑师有哪些人，做了哪些工作，尽量多搜集，建立起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慢慢的，“传统”的概念就会变成“传承”的概念。我希望的是一个年轻建筑师知道他老师做了哪些工作，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又做了哪些工作。这样，他就不会一个人对着一本外国杂志或者一个人对着一个计算机搜索那些零碎的、没有联系的信息碎片，而是有一个中国建筑的知識体系，对自己今天做的工作可能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崔彤：在学习和研究张开济先生的这些建筑当中，我有几点体会：第一个还是张老代表着一个群体，我把它称作为叫“正典”之路。他们所做出来的设计和理论，有着所谓的“中国的典雅主义”这样一个成分在里面。因为他们多在海外留学，又回到国内，在当年中国最早的一些建筑师事务所进行工作、学习、研究，一直成长起来，他们都有着非常扎实、稳定的知识体系和工作环境，有这样一个艰辛执着，但非常幸运的执业过程，所以他们练就了一套非常好的本事。

比如刚才永和老师提到的，张开济先生最早三年级时候的作业，这样一个纪念馆，虽然是一个水墨单色渲染，但我们能从中看到简化的新古典主义，让我们想起了林肯纪念堂，但更多的让我想起来是密斯·凡·德·罗做的西柏林国家美术馆。这样一个将经典的古典主义建筑转化成现代建筑过程中的第一步，它没有山花，没

有细节，但是还有柱式，六柱五间还是存在的，这个非常难得，给我们今天很多启发。第二就是张老提出的建筑和艺术的大众化和人民性的问题。这点跟有些建筑师认为要把自己的建筑作为艺术品，高高在上，成为一个传奇的永恒的存在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建筑不仅是要看的，而是要用的，是好管好建的，是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价值。

第三个体会就是张老融合和转译了中国古典建筑，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关于形构，比如刚才我们谈到的“四部一会”的“类中式”建筑的感觉。他有着西方古典主义的“三段五体”，也有城门楼子的形象。但它也有一个我觉得“丁”或者“有”字形的平面构成，空间是现代的，这是形构。

我觉得受到更大的启发和启示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三里河整个居住区，我们带学生也去参观过，我觉得它现在依然是社区居住小区、邻里环境及居住环境当中“典范中的典范”。我之所以这么谈，就是中国建筑一直谈“建筑包着花园”，而在三里河社区当中，我们发现是双层。这里面不仅有房子，而且还有院子，还有园子。中国人所要的理想的居住环境是房子、院子、园子，而且是层层套叠，我把它称作“中心结构的边界原型”。在这里面，张先生不仅传承了关于中国传统的经典的式样，“三段五体”，古典主义转译等。最关键是他传承和解读了中国传统空间的价值——房子、院子、园子的原则，用中心结构边界原型来处理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依然还是典范。有几次在设计当中，我还曾经有意去尝试和学习过这样一个方式，而且“守边”的方式完全改变了现在这种排排坐的日照求出来的东西，这是我的第三点体会。

还有一点体会，我觉得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就是低调的为城市服务的空间。以张先生做的观礼台为例，他创造了一个在所谓我们国家政治中心核心建筑当中，在“大式建筑”和“政治建筑学”所主导下的一个非常好的建筑体系，那就是

天安门观礼台。中国传统建筑的感觉就是“筑高台以壮雄威”，没有观礼台就没有天安门今天这样的雄伟，但是观礼台本身的姿态又很低，创造了这样一个雄伟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天安门广场。但是他自己又低调地悄然于旁边，这个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增加了环境的场所感，塑造了神圣的伟大的这样一个广场空间。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场所观、城市观和政治观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一些简单的学习和体会。感谢大家。

伍江：今天这个讨论特别重要，所以我想简单谈谈三点体会。

第一就是说这代建筑师真的特别重要，整个中国建筑学历史并不长，尽管我们说中国有很悠久的建筑传统，但是作为现代的西方建筑学观念，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事物。第一代建筑师是功不可没的，把很多西方的观念带了进来。

张先生这一代可以粗粗地算作是中国的第1.5代，或者说是中国国产第一代建筑师。这批建筑师其实承担着跟第一代建筑师一样的责任，但是他们处于整个国家历史交错的时候。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参与了更多的实践，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多重要建筑是这一代建筑师完成的，这代建筑师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上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对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对于第一代建筑师的特别关注，已经出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是对于张先生这一代建筑师研究还不多。据我所知，像同济、清华、东南都有一些学生在以他们这一代建筑师为题在研究，但是真正看到的比较好的成果还不多。程力真老师这本书非常完整全面地讲了张开济先生一生的经历，甚至连张永和老师自己都觉得书里的很多研究，超出他对自己父亲的了解，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开一个先例，能把中国近代早期建筑师、建筑学科以及建筑设计影响的研究拓展到更宽一点，拓展到张开济先生这一代建筑师，并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来研究他们，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体会，张开济先生这代建筑师一生的追求和成就，我个人理解，一直处于三个矛盾、三个纠结和三个追求当中。这三个矛盾究竟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中国建筑跟西方建筑的关系。他们不管是从西方留学回来，还是第一代建筑师教出来的（所谓的第一代半建筑师），所学的建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设计方法、手法，基本上都是西式的。这些西方的影响在他们一生当中，当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不断的升起，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现代教育之后，对自己与中华民族传统的认识之间一定产生了一个反差，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反差。他们这代人是非常纠结的。一方面他们觉得西方对于文化传统的传承，是我们中国要学习的。我们中国最近这 100 多年实际上是断裂的，同时又觉得很多是西方的东西，不是中国的东西，那么中国的东西究竟在哪儿呢？一直在纠结。

第二个就是中国建筑跟现代化的关系，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是曾经在西方留学，还是像张开济先生这样在国内念书，老师在教室里面给他们讲的都是我们正在走入现代的时代，要追求一些跟现代生活需求，经济社会发展，人类的文明进步相适应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究竟是以西方的传统建筑为参照呢？还是以其他建筑类型为参照呢？他们是有纠结的，从梁（思成）先生杨（廷宝）先生身上就看得得到，当然在张开济身上就更为明显，因为越是年轻，就越是敏感于现代思想、现代社会以及它在建筑上所应该呈现出现象。

所以您看张老的作品里面，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流露出又想传统又想现代的意味。当然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和思考，对于那代建筑师来讲，越往后他们就越多地认识到西方和现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两面，是一件事，所以他们并不愿意把西方古代的跟西方现代的理解成一个强烈的对立面。换句话说，对于中国建筑师或者作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不论是西方古代的还是西方现代的，都代表现代的，这是我

多年思考的一个结论，并没有像西方现代建筑师，那样把现代建筑看作是古代建筑的一个对立面。对于中国人来讲，因为西方是后来进来的，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在时间上是没有那么强的前后关系的。对于他们来讲，只要是西方的就是代表现代的，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个纠结就是中国建筑跟中国传统的关系，因为他们越是对建筑学了解，越是在中国社会扎根，越是在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就越会思考中国传统建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刚才说对他们来讲。西方传统跟西方现代之间的界限不一定那么清楚，但是中国传统跟中国现代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对他们来讲，做传统与做现代的是对立的，怎么能够把它融合起来，对他们来讲是纠结。

如果说他们在 1949 年以前这个纠结还不那么冲突的话，那么在 1949 年之后冲突就非常的明显了，因为来自于政治的和来自于其他方面的要求，让他们试图把现代化跟中国传统两者合二为一，而在他们心目当中，这两个之间合二为一是有难度的。

这其中，当然有的建筑师走得更远一点，我以为像张开济先生在做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的时候，他是走得最远的，他已经摆脱了建筑的风格，摆脱了纠结于是现代还是传统，中国还是西式，它完全从人的需求出发，从环境协调出发，他要做的是一个跟天安门城楼与天安门广场混为一体的一个作品。

至于到底是西式风格还是现代风格，他是不太关注的，而在他那一代建筑师里面能够这样去想的人不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当然这代建筑师在这个方向上都多多少少在探索，有人走得远一点，有人走得近一点，而张先生是属于走得比较远一点的，这个是我的第二个体会。

第三个体会就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也好，第一代半也好，这些建筑师所追求所探索的，或者说他们所面临的这些需要解决的纠结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当

下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师在中国建筑舞台上的表现，在世界建筑舞台上的表现，都是前几代建筑师无法同日而语的。我们前面那些伟大的建筑师，在世界舞台上其实是看不见他们的光芒的。

当下，中国建筑师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种在世界设计舞台上的光芒，似乎他们是从天而降的，是突然由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涌现出来的一批，我个人以为他们的设计思想和他们的创作实践，其实跟前面一代、两代、三代的铺垫是完全连为一体的。尽管当中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一些中断，但是总的来说思想是一体的，他们所纠结的其实还是那些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中国建筑跟西方建筑的关系，中国建筑跟现代建筑的关系，中国建筑跟中国传统建筑的关系，这些关系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当然现在又变得更复杂了。比如说跟城市环境的问题，跟自然环境的问题，跟现代技术的问题，怎么能体现建筑师本身的文化创造，现代科学技术对建筑产生的那些冲击变得更为复杂了。老一代建筑师所集中想解决但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些问题，当下建筑师仍然面临，所以我个人的体会是当代建筑师在中国要想继续推进（中国建筑学的发展），如果我们还用建筑现代化这个词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的现代建筑或者是未来中国的时代建筑，应该朝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

今天的中国建筑师获得的国际社会地位已经远远高于上一代上两代建筑师，但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自满自大。我们中国建筑师所做的作品现在已经全世界关注了，但是他们在建筑设计或者说在建筑学的文化属性上，在建筑学的形而上境界上所能达到的高度，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差距的。我们一个好的作品可以拍非常漂亮的照片，可是却讲不出来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甚至于他自己也不一定讲得出来。这个不是简单地讲说不出或者评论家评不出，而是中国建筑学还需要在更多形而上层面的思考，使得我们有一个思想上的跨越，使得中国的建筑学真正取得历史性的

跨越。建筑尽管是一个造房子的工程，但如果仅仅把建筑理解成是造房子，就永远也摆脱不了造房子的境界，永远也不能上升为文化创造的境界，而我个人以为建筑文化创造是人类所有艺术门类中最重要的文化创造之一。

张路峰：程老师这本书其实是基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作为她的导师，主要是在选题和研究部分有些参与，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研究阶段的一些基本设定或者说叫研究设计交代一下，以便让大家了解这本书的出版背景。

首先是选题，选题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或者说是一种缘分。鲁力佳是我大学同学，张永和老师也是多年的朋友，一次偶然机会，他们提到张开济老先生离世多年，书房里有好多资料，需要找懂专业的人帮忙整理。我马上意识到，那些从来没有面世过的资料一定很有研究价值，于是建议以整理资料为契机，开展对建筑师张开济的研究。当时程老师正处在开题准备阶段，已就另外一个选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我马上跟她商量，希望把选题转到这个上面来。她也表示很感兴趣，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这些独家一手资料的整理工作，奠定了研究的基础，也决定了论文的学术价值。所以在这一点上非常感谢张永和、鲁力佳作为张老家人对我们师徒二人的信任。同时我们也感到，整理、利用好这些宝贵资料对于学术界是一种责任。另外，程老师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学生，她读博士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工作多年的老师了，做事很靠谱，工作推进得很快，在疫情期间克服了很多困难，一次又一次地去那间尘封的书房去整理资料，非常细心，有条理。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学术立场的设定。由于我们与研究对象的距离比较近，或者说有些近水楼台之便，但这恰恰也是个缺点。作为研究者，跟研究对象拉不开距离，就可能会失去客观、独立的学术立场。所以一开始我就嘱咐程老师，一定不要仰视你的研究对象，不要把张老先生当作一个高高在上

的偶像去崇拜，这样的话你没法研究他。再一个就是提醒她不要把张永和老师当成“甲方”，你的研究不是在向张永和老师交代，而是要向整个学术共同体交代。而张永和老师也非常自觉，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除了开放资料、接受访谈，并没有输入任何他的个人观点，所以说这个研究是一个独立的工作。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下。

第三点就是关于学术把关。我们建筑学科其实是分建筑历史、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等不同研究方向的。我本人其实是属于设计方向的，在历史方向也是外行，虽然懂一点一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方法，但做这个选题我实际是没有什么底气的。所以就动用了我的朋友圈，几乎把我所能请到的建筑史学界的大咖全给挖来了，他们都非常支持我。像单踊老师，是张老先生母校的代表；然后远在美国的赖德霖老师，是我非常敬佩的学友；天大的徐苏斌老师，清华的刘亦师老师，北工大的杨昌鸣老师，都是在这个领域里相当有建树的学者。请他们来做评阅和答辩，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论文的学术质量就有保障了。在这里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奉献。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马国骥院士，本来我不好意思麻烦马院士，但是我又一想，这件事情必须要请马院士出马，因为他是北京院的代表，没人比他更了解张老当年的工作情况。马院士爽快地答应了，并亲自到场主持了程老师的论文答辩会，使得这份研究成果的分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另外必须要提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得到徐全胜董事长的大力支持，他把这项研究纳入了北京院院史建设的框架中。

上午听了一些老师的发言，把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谱系建设起来，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我也深有同感。好多工作等到这一代人故去之后，再去搜集整理都已经来不及了。像张老先生这样特别爱收藏资料的前辈并不多见，很多人的资料都慢慢流失了，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有很大困难。我们北京院原来的“八大总”当然要做，其实现在的“八大总”，包括在座的邵总的资料也都得好好留着，咱们

不能等资料没有了再去搜集，太费劲了。新“八大总”的研究现在就该做些准备。今天在座的李浩老师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要把口述史这块先做起来。

最后我还想说说这本书的出版跟学位论文的关系。我们当初的设定是把研究和出书严格分开，变成了两件事。研究是出书的基础，或者说，出书是研究的副产品。学位论文和出版物所面对的读者是不一样的。所以程老师在论文阶段完全没去想出版的事情，答辩完成后才开始考虑如何把它改编成一本书。出书的过程我就退后了，完全由作者、责编主导，按出版规则对学位论文进行了大幅度改编。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程老师来说，是完成了从学生到学者的身份跨越，祝愿她在未来学术道路上有更好的发展。

单踊：今天，是张开济先生传记问世的喜庆之日。作为张老求学阶段的“知识供给侧”——母校东南大学的后学，我们无比欣慰！在此，我想尝试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早期的建筑教学做个生态还原。希望这一对专业学习环境的直观描述，能为张老传记的阅读有所补益。

在对应的“1933年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课程标准”基础上，通过查对各种教学文档史料，将各门专业课相关信息汇总成表（图5），张开济当年的专业学习的情况就基本清楚了：

张开济就学的1931—1935年夏，是中央大学历史上在经历了短暂“易长”风潮后、抗战爆发前的第一个平静发展期。其时，他所在年级的建筑系专职教师有：系主任留美硕士生刘福泰（1933年前及1934年后系主任）、留法毕业生虞炳烈（1933—1934年系主任）先生，留英毕业生李祖鸿，留日毕业生刘敦桢，留德毕业生贝寿同（字季眉），留美硕士生卢树森、谭垣、鲍鼎、陈裕华，以及留法毕业生刘既漂。

首先，看教学的总体计划。

张开济所在年级开设的专业课共30门、113学分，大致可分为“设计”“图

艺”“史论”和“技术”四类。其中前三类均覆盖了一至四年级，后一类自二年级开始直至四年级。四类课程的门数/学分数/学分占比各为：“设计类”5.5门/42.5分/37.6%+、“图艺类”艺.5门/25分/22.1%+、“史论类”4.5门/14.5分/12.8%+、“技术类”术3.5门/31分/27.4%+。

从这份教学计划中不难看出，中大建筑系首创的“设计为先、艺技并重”这一综合性大学的工学院办学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少数课程兼有两类性质（表内将其学分、门数各记一半），这也表明了原理讲授与操作训练的关联备受重视。

其次，是实际的课程安排。

“设计类”课程中，主课“建筑图案（设计）”的教学由时任系主任的刘福泰先生整体安排并亲自主持二年级，我系第一位宾大学人、为中大的建筑设计学科奠定基础的谭垣先生负责高年级“建筑图案（设计）”。一年级的设计初步（含“建筑初则及建筑画”“初级图案”）由颇具包豪斯风范的贝寿同（字季眉）先生负责，“内部装饰”课由巴黎美院毕业、并在国内建筑理论和设计界颇具影响的刘既漂先生教授。理论讲授与设计联系结合的“都市计划”“庭院学”由我系率先对城市规划问题予以关注的虞炳烈先生负责，中西“营造法（构造）”由深谙机械及建筑结构

技术的鲍鼎先生讲授。

“图艺类”课程中，建筑制图相关的“投影几何”“透视画”“阴影法”由治学严谨、图文不苟的刘敦桢先生讲授。其余的“徒手画”“模型素描”“水彩画”均由绘画造诣极深的李祖鸿先生包揽。

“技术类”课程中，除了“营造法”“建筑师职责及法令”明确由鲍鼎先生、刘敦桢先生分别讲授以外，其他众多课程因暂无史料支撑而情况不明。有资料显示，家中开有营造厂（建筑公司）而熟知建造技术的陈裕华先生承担了其中部分课程的教学，其他（暂列陈裕华等名下并以虚线框出）的应该是由中大的土木等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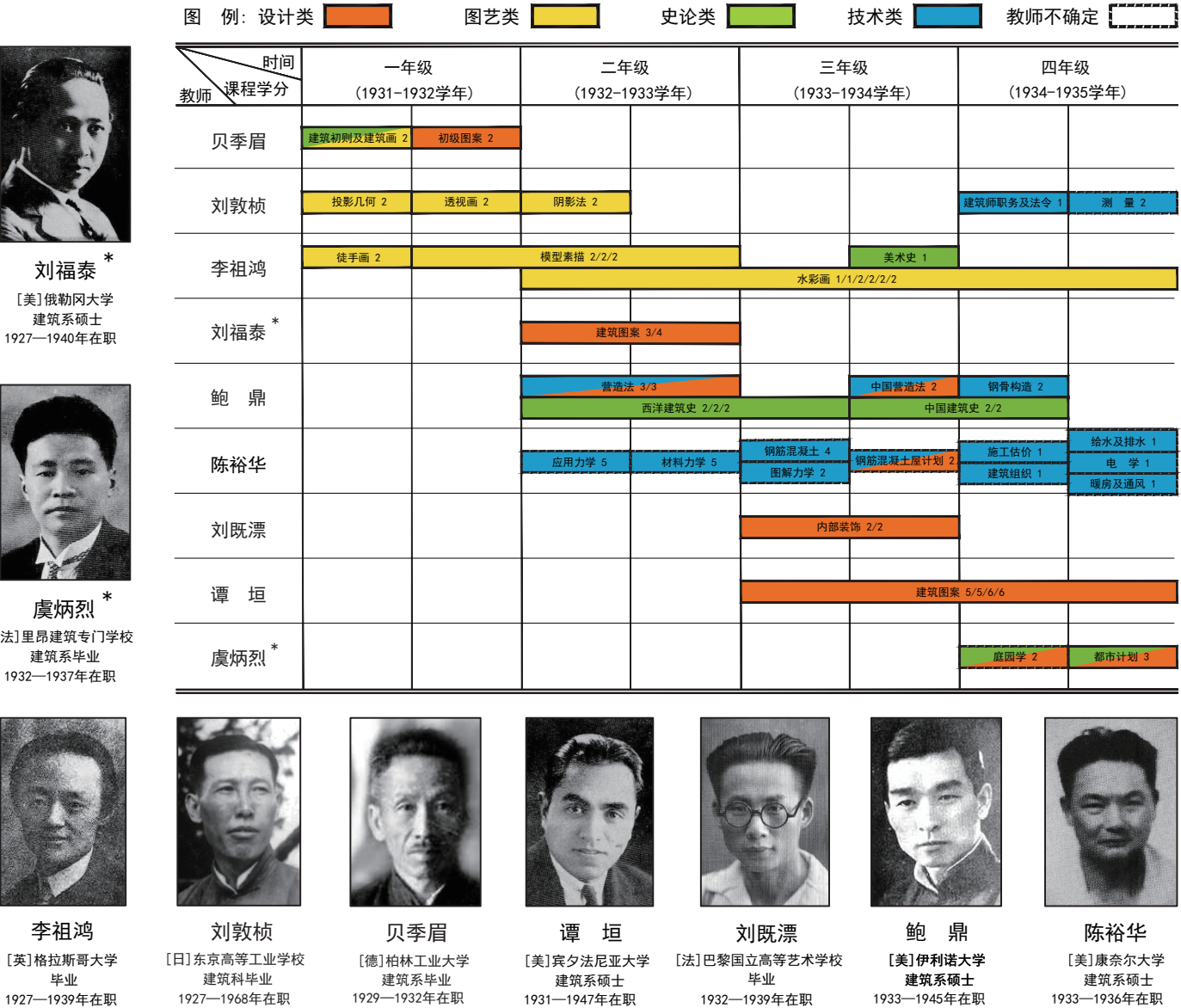


图 5：张开济就学期间中大建筑系专业课程信息一览

科协助完成。

再者，是我个人对教学观念的理解。

我完全同意张永和老师和他转述童明老师关于“布扎（学院派）”的见解——硬性地去就其局部表征做标签式定义都是徒劳的。原因在于“布扎”是个开放和不断发展的体系。布扎原本就并不排斥古典以外的形式和技术，张老师也提到过巴黎美院的众多学者都有过颇具现代意识的积极探索，如L.B. 龙德莱（L.B.Rondelet）和J.N.L. 迪朗（J.N.L.Durand）的理性主义倾向、E.L. 部雷（E.L.Boullée）和勒杜（C.N.Ledoux）的幻想风格等。新古典主义盛行时在巴黎的美术学院施行的教学法，偏重艺术性、古典形式的感悟和培养是天经地义的；1900年代后传入美国的大学体系中，新技术的大量充实和教学法的更新也是无可厚非的；进入背景迥异的东方大国的高教系统后，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基因的作用、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展的需求以及全面学习苏联的影响，激化了教学体系的本土化、现代化推进更是势在必行的。被普遍誉为中国“学院派”建筑教育大本营的中大建筑系是上述兼容和演进最典型的案例。

教学计划层面，综合性方略是中国国情使然。上述各类课程的门数、课时等的整体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大建筑系决策者们的适应性思考。即设计及图艺课所承载的“艺术性”和技术课所指向的“技术性”兼具的战略价值所在。

具体实施层面，多元化原则是施教者的自然。诚然，“布扎”教学法在中大设计类课程的教学得以传承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就中大的教师们如杨廷宝、童寓等先生而言，在外求学时对新兴现代主义的体会、回国后本土建筑文化的补给以及苏式“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介入，使得他们在建筑设计实践中早已将现代化、民族性因素运用自如。因而在实际施教过程中，除了低年级的西方五柱式描绘以外，高班设计中的西古/中古、民族形式/现代风格等已成为完全无差别的学术取向，这就是杨老在设计课上

为学生们改图时常说的“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金磊：程力真博士这本《建筑师张开济》其价值不仅仅是为中国第二代建筑师的学术生涯做了书写，更是对强化中国建筑师的代际研究，启示中国建筑界要致敬百年建筑巨匠有帮助。有感于近十年来，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的支持下，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除每年推介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外，还关注为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作出贡献的建筑师，北京建院1950年代的“八大总”中的张镈、张开济、赵冬日恰是其中的“百年建筑巨匠”。2022年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发布50周年，在追寻中国遗产的世界价值上，不能不瞩目这五十年来中国建筑师为传承与创新的设计足迹，这里不仅有1999年UIA北京建筑师大会上《北京宪章》的贡献，更不乏如张开济大师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的设计与理论成就。

其一，张开济的中国建筑现代化思想据程力真《建筑师张开济》一书介绍，早在1979年张开济就在《北京日报》撰文《实现建筑现代化首先要思想现代化》。(1)他从国情出发强调中国建筑必须现代化。他指出，用新材料、新技术及新施工方法建造的建筑，并非就是现代化建筑，建筑现代化重在内涵，重在它要追求内容而非形式。建筑的现代化绝不是摩天大楼，他引用例子说明在西方国家已经证明高层建筑（特别是高层住宅）已经过时。他还从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视角分析，强调现代化非工业化，中国建筑现代化之路，需要先进和文明体验并存的现代性，这是国情国力所决定的；(2)他认为中国建筑现代化首先在于人，要先提升建筑界各方人士（设计者与管理者）的思想现代化，这中间也包括社会对建筑师职业尊重和理解。1978年10月在南宁召开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委员会，张开济总建筑师畅言三条措施推进建筑现代化即：要积极开展设计竞赛；要积极推动建筑评论；要

深度开展与设计相关的理论研究等。他列举了诸方面建筑师思想缺乏“进步”的症结如：设计追求气派，“好大喜高”；设计千篇一律，“公式主义”；设计因循守旧，相互抄袭；设计缺少主张，人云亦云等。

张开济中国建筑现代化之思的进一步阐述，体现在他于1985年中国建筑学会繁荣设计创作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以一介建筑师的社会责任表述了“建筑设计要三尊重”。其一设计要尊重人。他认为建筑设计要以“人”为主、以“建筑”为从，这种从属关系的表述在业界较为罕见，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设计体现。他的全面为“人”设计的理念既针对社会和国家，更针对个体与家庭，是一种尊重“人性”的朴实表白，他曾说“……关怀人的精神需要，这也就是应该尊重人的思想、感情和爱好”；其二，设计要尊重环境。他倡导设计要“因地制宜”，反对一味追求的轴线对称的手法，批评那些“唯我独尊”、“旁若无人”的例子，无论新建筑，还是旧城改建项目，要以尊重周边环境为前提；其三，设计要尊重历史。在一次张开济大师与中青年建筑师交流会上，他转述在纽约与贝聿铭先生会晤时，贝先生对国内建筑师的话语“要在创作中找寻我们自己的‘根’，根就是历史，就是传统”。可见，在建筑师张开济心中，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承必须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才可创造出属于时代的建筑成果，传承是历史而非复古，中国建筑现代化要走尊重历史的创新之路（图6）。

其二，张开济中国建筑现代化的传承创新观

记叙一介大师的贡献既要那些淹没在史海中的人和事“活起来”，又要有激情澎湃写春秋的气质与胆识，这里需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唤醒与大师们共同的记忆，更要借助多种手段，穿越可能被扭曲的事实，以理性的视野和感性的心灵对历史做重构，还原历史、揭示历史、留住历史、守护历史。张开济总的理性精神、心性智慧与人文精神，筑就了他对建筑哲学思考的一贯态度。张总对感觉不信任，强



图 6: 2002 年张开济与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签约仪式上携手同行



图 7: 天安门观礼台

调逻辑优于偏好，理性大于感性，于是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他都可以聚焦并发现“真问题”。《建筑师张开济》一书用了相当篇幅，对早在 1979 年张开济大师就提出“文物古建的保护”作出评述。应该说 1979 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刚刚公布 7 年，城市与建筑界很少有人专门提及遗产保护问题，张开济大师的著述显然比 1982 年《国家文物保护法》及 1982 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还早了三年。张开济总确实在不少著述中强调，古建筑保护不仅不能破坏文化遗产，还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遗产与创新的现代化水准。他提出应遵循陈毅曾对古建筑保护的指示“修古建筑一定保持原状，不要对古建筑本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此他倡导传承保护古建筑的现代化制度建议即：凡古建的拆毁和修整都必须经主管部门审批；应保留一些四合院及私家庭院；应保护整个北京城的文物环境。有理由说，张开济是中国建筑界有前瞻性的设计大师，他是较早具有文化守望精神的建筑师，书中还让我们读到，他与一大批著名城市文化与古建大学者是挚友：单士元、王世襄、侯仁之、罗哲文、于倬云、郑孝燮、周干峙、谢辰生、吴良镛、阮仪三等。

张开济总不仅是在古都北京历史建筑上勇于传承做设计的人，更是使其作品与历史建筑自然融合，善于做好设计的人。如 1954 年他的天安门观礼台设计方案

(图 7) 中选并实施，社会各界认为它简直就是明永乐十五年的产物（天安门又称承天门，是 1961 年全国首批国保单位，设计者为明代御用建筑匠师蒯祥）。特别需要说的是，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支持下，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自 2016—2021 年已公布六批 597 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其中张开济领衔设计的至少有十项入选，这在中国老一辈建筑师中是罕有的，这些项目是：

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博物馆	(第一批)
北京“四部一会”办公楼	(第一批)
钓鱼台国宾馆	(第一批)
北京天文馆	(第一批)
天安门观礼台	(第一批)
百万庄住宅区	(第二批)
中央民族大学近现代建筑群	(第三批)
北京劳动保护展览馆	(第四批)
中央美术学院原陈列馆	(第四批)
蒲园(上海)	(第六批)

围绕中国建筑现代化展开的对张开济大师贡献的再学习仅仅是初步的，但它的意义、价值与联想至少有三方面：其一，由系统梳理张开济大师的“所做”与“所思”，还必然想到 20 世纪更多的中国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及第四代建筑师“群体”现代化探索之路，重在找到他们间的关联及思想取向；其二，研究中国建筑师文化是树立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方

面，尽管理论上讲，历史是无法还原的，但如果是有资料性、档案性支撑的传记描述，建筑大历史的科学性是可以保证的。需要的是要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采用历史真实性与叙事生动性的方法，给社会业界呈现更具传统、更富创新、更有启迪意义的好故事；其三，感悟张开济大师等先贤的建筑师精神，要学习他们心系国家、心系事业、心系人民生活改善的爱国奉献精神；要学习求真务实、明辨是非的创新精神；要学习严谨求实，带头营造创作环境的学术精神；要学习不靠一己之力，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的集体主义及甘为人梯的精神等。

马国馨：建筑师本身的职业与工作，在服务社会当中起的作用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要给我们的社会，留下这么多非常重要的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的东西。在创作过程当中，他的创作理念到底是什么？他的哲学观、价值观、方法论到底是什么，都需要很好的研究和梳理。

《建筑师张开济》这本书做了很多工作，是对张开济总一生成就十分详尽而全面的记述。作者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传主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张老一开始受大学教育到解放前的工作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最后去世，前后九十余年。所以从事这个过程的研究，首先就是史料收集得

全。张总这本书，是我目前看到的相关著作里材料比较全的。我想首先是张总比较用心，他把这些材料保存的有条理、很整齐，家属保管得很好，作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当然并不能说史料就全了，做研究工作不断地会有新史料发现，不断地推进研究。

除此之外，刚才张路峰教授特别说了，对传主的定位特别重要，就是说你不要仰视传主，要客观、要实事求是。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不是神，都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也有遇到挫折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如何把一个非常真实、生动的人物展现出来，这就是张教授讲的不要太仰视。第二个就是对史料本身也还是要进一步的分析，如张开济大学时期所受的教育，实际上前面列出受教的这个课程表应该可以说是中大 1935 级的同学的共同使用的表，大家都是受的同样的教育，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同时期毕业的同学，大家走的不同的道路。就以与张老同期的何立蒸、孙增蕃、王秉忱、徐中等人為例。这都是和张老同班的，可以看到在同样的教育条件下，每个人走的道路和学术思想并不一样，这里就有每个人对于老师和学科的不同看法以及受到的影响有关。

如果只是静态的来分析他受过的教育历程，当中缺的是什么呢，是缺在学习过程当中自己的想法。我并不是指这本书，在很多时候，传记或者回忆录中，有的很缺“人”的这个方面，所以事实上是我们研究这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上午说了，程博士这本书应该是对建筑师张总的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开端，随着新的材料的发现，或是对已有材料的不同使用，还会不断有新的认识。

另外在这本书里，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张开济总后期工作中，在城市建设、古建保护方面的材料比较全，因为这阶段公开的资料特别多。但是在建筑创作方面还有一些不满足。非常可惜，程博士无法采访到张老本人，而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只采访了北京院的黄汇和梁永新两位前辈，黄汇来北京院的时间比较晚，七十年

代后入院，梁永新虽然是第一代老人，但他一直是搞管理工作的，对设计过程了解的不是特别多。而对当时跟张老做革命历史博物馆、“四部一会”大楼、天文馆，设计上配合比较多的一些同事比如庄允昌、叶祖贵、黄乔鸿、宋融、刘开济等人，这些人已经故去了，没来得及采访他们留下资料，非常的可惜，这还仅仅是建筑专业，另外还有其他专业邱圣瑜、朱华樑、潘家声、曹骥、张云舫、郝凤德、董尚勋等人。因为一个工程尤其是大工程，并不是仅仅一个人就可以解决的，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而在这方面一手的采访史料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物的丰满度、可信度起到关键作用。

另外有些史实恐怕也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比方张总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如果从历史上分析，它是 1950 年开始建设的，张总在那时设计的，但那时仅仅是个简陋的砖木结构，共 4 座，可容万人，到后来很快就多次改建，规模也扩大，范围也扩大，结构形式也改变。如 1951 年增建几座小观礼台，1983 年拆除。1954 年改建为砖石混凝土结构，1959 年又在东西两侧增建两座观礼台，容量从 1 万人增加到 3 万人，2004 年又重新翻建，现在从规模上、从形式上已经和原来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评论“观礼台无声胜有声”，本身实际上说的是 1950 年的那一个。所以如何能够在介绍这个作品当中把它讲清，实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就是说当中还有许多情况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刚才有老师提到住宅建设中低层高密度和高层高密度的不同意见，大家说低层高密度好，可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又都是高层高密度。前些日子听说现在因为防疫的问题，高层又遭到了质疑。那时候张开济总主张低层高密度，张傅总提的是二环以内不要用高层，二环以外可以适当建一些高层。宋融总的意见是：“我是反对高层的，但是在现在解决问题不得不盖高层。”所以这种不同的意见，实际是一种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是有益于我们国家建设

的发展，高层、低层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同情况下不同对待，还需要实践来检验。最近中国工程院为院士们出了好多传记，我想如何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表现一个人，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院士是人不是神，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并不是他的全部，感觉有的描述得非常高大上，完美之极，或是为尊者讳、人为拔高，但有的就比较客观、显得真实、可信。

对于建工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因为建工出版社前前后后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书籍，尤其是最近出的《杨廷宝全集》等，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好。但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就是如何通过分析研究而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李浩：作为新中国首都，北京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先后评选过几批“十大建筑”，它们对于整个城市的形象起到了重要塑造作用，其中首推国庆十周年时兴建的十大建筑，它们是经典中的经典。在这十大建筑中，就有两个建筑（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是张开济先生负责设计的。除此之外，张先生还负责过其他许多重大工程，如北京西郊“四部一会”建筑群、百万庄小区和三里河小区、北京天文馆、天安门观礼台等。与张傅和赵冬日等先生一样，张开济先生是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中的佼佼者，是一位书写历史、创造奇迹的国家级建筑师。

那么，张开济先生为何有如此幸运？这大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他早年在国立中央大学接受本土布扎教育的专业训练，深受谭垣和虞炳烈先生等的影响，专业基础功底深厚扎实。其次是张先生本人所具有的文学爱好、人文素养和思辨精神，这使得他在建筑设计中经常深入思考如何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问题，从而达到了超越一般建筑设计的更高的境界。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第三方面的因素，这就是时代的命运。

张开济先生 1935 年从中央大学毕业，在近代中国“黄金十年”的尾声中开始职

业生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先生已经有过14年的职业磨炼，建筑设计已经达到相当娴熟的水平，从而在客观条件上具备了担当重任的技术条件与能力。不仅如此，从1949年到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城市建设的“辉煌十年”，在这个时间段张先生的年龄是从37岁到47岁，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一个黄金阶段，正是张先生个人的“黄金十年”与新中国首都建设的“黄金十年”完美重叠，才使他创造国家顶级建筑设计作品成为可能。

张开济先生是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中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可以说，中国第二代建筑师是一个相当幸运的群体，尽管他们也有一些不幸之事，但他们能够与祖国的大规模建设潮流相伴相随，自己的专业历程与祖国的需要相契合，他们在服务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同步实现了个人的理想与抱负，这是其他时代的建筑师所十分羡慕而无法奢求的。

我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在阅读《建筑师张开济》一书的过程中，我常常去想：50年代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有什么差异？众所周知，到1949年时，中国建筑界已经有两代建筑师先后登上历史的舞台，与之有所不同，中国在近代虽然也有一些规划人员从事过一些规划活动，但在社会更替、战乱纷飞的时代背景下，对一个庞大的城市进行整体设计的规划业务及规划工作者，数量是极少的。规划师作为一个群体以受人瞩目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大概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新中国刚成立时既没有什么规划人员，更没有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当时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主要是一些相关专业如建筑学、土木工程、园林、道路和市政等专业的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城市规划工作岗位，他们在来华苏联专家的教导下，在实际业务磨炼中逐步提高规划工作能力，当时规划工作的情景大家常用“苏联专家带儿童团”加以形容，“儿童团”就是指刚到规划岗位上的一批年轻的毕业生。当时中国第二代建筑师基本上已经可以担当重任、独当一面，

而规划师个体在城市规划运作体系中多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螺丝钉而已。

进一步比较，与1955年建筑界曾经历一场“大屋顶”批判风波相类似，1957年城市规划界曾遭遇一场反“四过”（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标准过高和求新过急）运动，1960年又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4年干脆撤销了中央城市规划研究院的建制，大量规划人员被下放，不少人从此终生离开了城市规划战线。与建筑师相比，规划师群体更为不幸。

即便跳出历史的囚笼，单纯对这两个职业进行对比，也可以认识到两者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建筑师以建筑创作为己任，在建筑创作活动中，主持建筑师的个体往往具有明确的主导性色彩。而在城市规划活动中，由于城市规划工作具有突出的综合性、政策性和复杂性，规划师个体往往只是一个参与和配合的角色而已。好的建筑师，可以在专业技术造诣、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等方面全面斩获。而在规划师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强调集体意识、集体劳动、集体协作、集体成就和集体贡献，个人的成就、作用和贡献没有认定的机制，个人的角色被极大地压制和遮蔽。从城市规划角度，建筑师是令人羡慕的。

另一方面，从张开济先生的专业活动和思想发展，也可以观察到建筑师与规划师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张先生在追求中国现代建筑道路的过程中，他关于住宅建设理论、文物保护思想、城市更新和老城保护的许多思想、呼吁和建议，显然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建筑设计范畴，与城市规划工作的关系甚为密切，也可以说是城市规划层面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晚年的张开济先生，某种程度上开始了从建筑师向规划师的转型。与建筑设计专业相比，城市规划工作的优势之一恐怕就是其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规划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城市规划工作者可以更好地、更多地为城市中的众多普通市民全体所着想、所服务，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广大规划师可以感到欣慰的方面。

徐苏斌：首先，特别感谢大会主办方提供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

怎么样去理解张开济先生？我认为张开济先生被称为大师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意识地一直在探索用什么样的内容去表现一个国家的新建筑。

他的人生高峰阶段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需要与之匹配的建筑创作，跨时代的建筑，这就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仅有舞台还不够，还需要实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院的“八大总”在当年实际上是起了领头羊的作用，有很多外地的建筑师都在模仿北京院的经验做法，应该说是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同时站在了国家的高度，那么怎样才能具备这样的潜质？

程力真老师的研究让我有感于：一方面是他们的人生进程中，站在跨时代的节点上，他们受到的教育很多是家里传统的耳濡目染，可以说是儒释汇通。程力真老师也在她的书里写到“家源”非常重要，可能他们不再接受四书五经的传统私塾教育，但家庭对他们的影响，与经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年轻人不一样的，传统的“家源”其实对第二代建筑师们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同时接受新式教育，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到国立中央大学，新式教育是塑造跨时代建筑师特别重要的条件，也是基础。在这基础上需要个人探索，正如刚才张永和老师谈到的，整个过程张开济先生从来都没停止过探索，一生都在探索。

张开济先生有很多的探索途径，这些探索途径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他来讲这些探索都变成了建筑师的营养。

单踊老师刚才提到，张开济先生在中央大学受到的教育，除了美学方面，布扎体系的传统教育外，还有日本的工学教育，这种工学和美学两种体系并重的教育背景成为他重要的探索基础，所以，他一直在探索用什么技术去回应那个时代，或者是用什么方案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

同时，还有很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张开

济先生的思想和怎么样回答“中国应该走什么样道路”的世纪之问。张开济先生曾在杨廷宝先生的事务所工作过，然后再成立自己的事务所。今天我们通过他的作品，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他对该问题的回答，一方面是建筑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表现，这是最基本的，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因为跟经济条件不符合，1950年代初的大屋顶不适用，所以探索了平屋顶的形式，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是如此。所以他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怎样与中国的实情相结合。另一方面怎么表现中国的需求，他抱着非常谦卑的态度面对传统，不是作品直接表达传统，而是表达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从规划的角度去探索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他在思索新中国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具体形象。

张开济先生探索的道路和经历对今后我们怎么去理解传承给了很多启发，我们以前理解传承都是比较狭义的，比如“大屋顶”的形式，其实不是，应该有很多种传承的可能性。

再回到张开济先生的探索，我觉得是多角度多方面的探索，所以今后我们怎么样去像张老这样既传承传统又做好当代表达，这是给我们的启示。

金卫钧：我是1988年4月从天津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很遗憾并没有参与到张开济总直接指导的项目。但张总的故事、张总的设计、张总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当时张总的知名度非常高。

张总职业生涯延续71年。第二代建筑师更多呈现的是集体创作，个性体现不多，但尽管如此，张总很多作品还是光彩夺目。我们今天研究他们的作品，应当在当时的背景中来看待这些作品，而不能以现在的审美评价去研究，因为评价标准不一样了。所以从探索性和寻找方向这个角度来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产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中国建筑史角度来讲，他可能只是创造了一小步，然而对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中国

的建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今天有一个主题是“所学所思所做”。从“所学”来讲，大家都知道他小学到高中学习都很好，大学一年级学习一般，三年级以后学习很好，这也如实地反映出他始终为自己的梦想而学。“所思”就是从开始到最后，他一直心系社会，心系百姓，心系国家。“所做”就是建筑师的责任与担当，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怀，从入行到执业高峰，对城市发展的关注始终如一。我觉得应该把“所学所思所做”改一下，应当称作“敢学敢思，敢做敢为”，这样更能体现我们应该从张总身上学习的精神。

具体来讲，张总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不只是完成建筑设计，而是在设计作品的过程中，时刻思考为社会解决问题，带有思考性地去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即“把脉”。“把脉”有两个含义：一是找到方向，一是解决问题。

如探索低层高密度住宅，从实用出发的住宅标准建设，古城保护，推动无障碍设计等，这些都是具有引领性的方向。尊重时代发展，引领时代脉搏，推动城市建设是第一方面的体现。

第二方面，他的英文水平高，文学功底深，写了很多文章呼吁和传播建筑思想与建筑文化，希望社会产生共识：到底什么样的城市建设才能尊重和保护我们的文化。

另外，张总的思想一直与时俱进。比如天文馆的扩建，当时张总做了很多方案，一个是将原来的建筑保留放在中间，其他扩建部分放在四周。另一个是现在实施的方案，将扩建部分作为背景。我认为现在实施方案的处理方式很好，后面的玻璃幕墙是虚的，很低调，把原来的建筑衬托出来。这种低调，谦虚地展示了设计师的功力。玻璃幕墙的凹进去和圆顶的退让，“惹不起躲得起”的方式实际上渗透着当代的设计思想。包括内部空间的形式，隐含宇宙与天空的关系，这就是与时俱进。

大家也提到建筑教育，我觉得几个方面很重要。首先是开放的教学，张先生在

大学既接触到了西方的五柱式，也学了中国的柱式，他是在中西混杂中汲取营养，教学是开放的；其次是兴趣培养，干自己喜欢的事也是重要的；再次重要的是为什么而学习，带有使命地去学习，再加上兴趣就会无而不胜；最后，还有家庭教育影响，包括文化背景，英文背景，国际化的视野等。人文的土壤，美学的滋养都很重要，好的文学功底实际上代表着思考的能力，哲学思想、美学思想都有所体现。建筑师实际上是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总的来讲，闪光的不只是张开济先生的作品，更是他对待建筑设计的态度，对待工作的热情，心系社会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去学习。谢谢大家。

杨昌鸣：这张照片是张总在1991年与东南大学的郭湖生先生、钟训正先生去桂林参加民居会议时的合影（图8），是钟训正先生所收藏的。为什么我要选这张照片，是因为我想补充说一说张开济先生在民居研究方面的国际视野。

在《建筑师张开济》这本书里，限于篇幅，作者没有对张先生在民居研究、乡村建设以及古建筑方面的内容过多地展开。事实上，张先生在村镇建设和民居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先生从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究村镇建设，包括民居研究。

张开济先生对于民居的研究，具有很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一看到广西侗族民居，就“感到这里真是人间仙境，同时也是一幅美妙无比的，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很难看到的民族风情画。”^①

张先生考察中国民居时，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敏锐地将其与西方建筑相关联。例如，“火塘”是侗族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很少有人将它与西方的“壁炉”相提并论。然而，“火塘”却使张开济先生“联想到西方住宅中的壁炉，西方人从来习惯于围绕着壁炉来生活起居，时至今日，暖气设备早已取代壁炉了，可是在许多高度现代化的西方住宅中依旧保留着壁炉，不仅作为室中装饰的重点，而



图8: 1991年张开济先生参加桂林民居会议与东南大学部分师生合影



图9: 云南傣族民居保留的火塘

且也是家庭团聚的中心，真可称‘积习难返’了”^②。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少数民族住宅中。尽管有的民居中的“火塘”现在已经不再用于取暖或做饭，但依旧将“火塘”保留下来，每天都聚集在“火塘”四周喝茶聊天。“火塘”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家庭生活和精神中心，与西方的“壁炉”如出一辙（图9）。

至于侗族村寨中常见的鼓楼，张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鼓楼的位置和功能来看，它有些类似西方城镇中的‘市政厅’，在它的一侧，往往还有一个戏台，那就是村民们的‘歌剧院’了”^③。

这些鼓楼又使张先生“联想到欧洲每一村镇中所必有的教堂，它们面积不大，但是都有一个尖塔形的钟楼，这些尖塔大大丰富了小村镇原来比较平淡的天际线，使得它们更为美丽多姿。看来这些教堂和鼓楼，虽然一洋一土，同样都对它们周围的环境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④

张开济先生还将意大利的一些著名的桥梁与侗族的风雨桥加以比较，认为“它们和我国的风雨桥虽然是一西一东，相距万里，却同样的既方便了行人，又美化了环境，成为水上的人造彩虹。”^⑤

除此之外，正如张开济先生在1990年代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研究古建筑“不单是停留在发扬研究古建筑上，而是发扬光大，提高新建筑的设计水平”^⑥。因此张先生研

究民居建筑时，并不仅仅只关注它的外观或造型，而是从设计的层面加以分析。例如，他从侗族风雨桥的设计中，就看到它们与“现代交通建筑的基本设计原则也是不谋而合的”^⑦。

除了侗族的鼓楼和风雨桥的艺术性之外，张开济先生还看到了它们所具有的公益性。“因为这些公益建筑（这里用‘公益建筑’一词可能比用‘公共建筑’更恰当）都是当地的人民自己出钱、出力所建造的，是他们共有的财产，也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享用的，因此可以说‘民建’‘民有’‘民享’的建筑”^⑧。

由此可见，张开济先生在做民居研究时不仅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也很注意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从民居的表象看到蕴藏在其中的丰富内涵。这种治学态度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叶依谦：按照北京院的辈分来讲，张开济总应该是北京院的第一代建筑师，马国馨院士是北京院的第二代建筑师，金卫钧总、邵韦平总是第三代，我跟刘淼总算是第四代吧。很荣幸跟鼎鼎大名的大师们在一个单位里工作，这是我们的骄傲。

实际上，我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最先知道的是张永和老师，当时张永和老师刚回国，来天津大学给我们作讲座，特别佩服，后来才知道张开济先生是张永和老师父亲。张开济总做的项目，我也有一些机缘跟它们有过接触。

第一个是他设计的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这是我每天上下班路上必经的，如果仔细地去感受建筑设计的水准，只能用“钦佩”两个字来形容。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四部一会”仿中国传统建筑样式，靠构造的收分把建筑的上顶部往回收，增加透视感，张开济总在墙角只是削了一刀，抹了一个斜角，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处理的手法特别棒，绝对是神来之笔，这不是一般的建筑师能做到的。他具有一个好建筑师的素质，他自己的学养和能力支撑他做到了这个程度。关于“四部一会”建筑群，抛开形式和是不是“民族的”不谈，本身就是建筑精品。

第二个与张开济总有接触或者说有交叉的项目，就是北京天文馆，天文馆是公认的精品。当时我在北京院三所参加过一轮天文馆扩建竞赛，在方案进行的过程中，参加过院里老总们的创委会，张开济总书面给了我们一个评价意见，在做扩建方案的过程中我们也因此仔细地研究学习了张老总设计的天文馆，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设计。最后因为天文馆扩建的历史特别长，前后很多轮方案版本，最后实施的版本还是挺成功的，与张开济总设计的天文馆老馆的关系也是建筑在城市里传承的经典案例，没有让天文馆老馆失掉风采，很难得。

第三个项目是张开济总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这是张开济总的建筑作品在城市里传承的典范。观礼台经过很多代的改

造,我觉得也是多代建筑师的建筑设计在文化上传承的案例,张老总设计观礼台的所有精华部分保留了下来,这是非常成功的传承更新活化的案例。

第四个项目就是这本书里浓墨重彩介绍的,也是张开济总的代表作——国家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是教科书级的作品,我也多次去博物馆参观学习。21世纪以来,也经过了一次大的改扩建,GMP的最终实施方案是一个很优秀的方案,体现出个城市、一栋建筑历经多年的一种延续、一种更新、一种迭代。

回过头看,钦佩当年的几位老总,他们对建筑的把控能力,他们对建筑发展的远见卓识,都为建筑将来的更新发展留下了更多可能。如果分析他们能做到这些的原因,我想这与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京院之前,都曾经是自己开办事务所的执业建筑师有着必然关系,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经济造价等相关经验,特别了不起。

实际上,还有一个项目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到,是全国总工会的老办公楼,一栋红砖楼。1980年代有过一次扩建,由北京院的柴裴义总设计,扩建风格跟张开济总的老楼是呼应的。在长安街上,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更新、建筑传承的案例。接下来,柴总又在他设计的扩建楼的南侧,设计了职工之家高层,既有延续,又有新的发展。2000年初,张老设计的老楼拆掉了,建了一个新的高层建筑。过了几年柴总扩建的部分也拆掉了,建了一个跟西边高层完全一样对称的高层,长安街上全国总工会的建筑痕迹就彻底抹掉了,这是一个负面的案例,很遗憾。

张开济总是一个超越主义的现代建筑师,因为他在他的那个时代,面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他提出的所有方案,解决问题的思路,全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现实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建筑师应有的种态度,也是我们后辈应该向张开济老总学习的精神。同时,他们在十几年的黄金设计时间,给北京城市定下了基调,包括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群,“四部

一会”,百万庄小区,等等,现在保留下来的建筑,形成了新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前,整个北京市的建筑文化基调,在这之后的建筑设计都是以这个基调为蓝本,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一代建筑师给北京城市发展以及整个行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戴路:我与张开济先生仅有一面之缘。1993年的五一前夕,张永和老师和鲁力佳老师回国,当时还是大一的我和4位大三的学长,一起来北京听张永和老师在清华建筑学院的讲座,因为讲座推迟了一天,我们就来到了张永和老师的家里,请教有关竞赛的问题。当时张开济先生和夫人都在。

本科毕业之后,我师从邹德侓先生,完成硕博阶段的学习。毕业留校之后,我除了教授设计课之外,还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现代建筑史,对张开济先生的作品进行了实地考察后,作进一步的讲述和分析。张开济先生的作品如他引以为豪的天安门观礼台,充满智慧地表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几位前辈从所学、所思、所作、所为的方面作了分享。下面我从第三个议题拓展一下,谈一下对中国第二代建筑师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研究的探索与思考。我选取的角度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语境中的“尺度”及第二代建筑师的住宅设计观念。对于第二代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刚才易娜老师、伍江老师也都提到,我不再赘述,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第二代建筑师有共同的集体经历,虽然受过第一代建筑师在学校和工作岗位上的精心培育,但由于动乱和战争,他们真正从事建筑事业,是在1950至1960年代。这一代建筑师绝大多数是从国内各大学毕业的。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大都年过花甲,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中国现代建筑发展过程当中,他们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国庆十周年北京十大工程及一些援外工程。

那么第二代建筑师的群体特征,可以总结几个方面:首先,动荡而封闭的教育

环境,亲历短缺经济的创作条件,所以这一代建筑师的创作原则是选择一种适于中国发展的现代建筑思想和方法。其次,真实厉行人本主义理想,“为人民而创作”,既要满足物质功能,又要满足精神功能,设想出最好的合乎人类需求的解答。再次,强烈的社会主义建筑文化使命。但在这个过程中,集体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个性化。最后,学院派教育带来的扎实功底和基本功。

作为第二代建筑师的张开济先生,他的作品特征体现在因时适地,厉行节约;学习苏联,主动之举;尊重环境,整体为先;小细部,大中国;以人为本,物为人用(图10)。

张开济先生重视居住建筑的设计,主张应该用“多层、高密度”住宅来代替“高层、高密度”住宅。建筑的尺度是建筑设计中的基本问题。尺度由对比获得,环境、人体与材料等是获得尺度感受的参照物。但在特殊时期,建筑艺术的停滞使得“尺度”的概念曾混沌不清,受政治因素影响,其参照物也并非人,而是忽略了个人的宏大时代背景。

第二代建筑师对住宅设计有着新的想法,比如汪定曾先生设计的上海曹杨新村(图11),华揽洪先生设计的北京幸福村(图12),那个时候其实华先生有机会做一些大的工程,但他对此兴趣不大,也不想跟随那个时期的“复古”潮流,更感到这不是一般居民急需的东西,反而觉得“小区”规划倒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张开济先生设计的百万庄住宅区(图13)是共和国第一住宅区,室内比例接近方形,采光通风良好,与苏联寒冷地区的大进深内廊式单元完全不同,与北京院标准室在同一时期设计的小开间单元相比也要舒适得多。当整个社会都在追求“超人”的宏大尺度,以精神性施以政治的威压,个人的感受被忽略时,建筑师依旧能从“人”的感受与视角去思考。这既体现在对复古符号化做法的拒绝,刻意地回避一些项目,而选择人民真正所需的住宅建筑设计,也体现在灵活地布局、设计符合现实情况的



图 10: 张开济先生设计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三里河部委办公大楼、北京天文馆



图 11: 上海曹杨新村总平面图

户型并组合，在“节约”的前提下尽量使之更符合使用需求。

第二代建筑师借鉴民居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对形式的关注上，比如尚廓先生文章中有对于庭院式住宅的考量，张开济先生文章中对多层住宅的讨论。

在向外探究的过程中，一些国外的著作与研究的引入，使环境心理学、环境行为学及对人的行为心理的研究，为中国的建筑设计带来了新的参考依据。

建筑师也通过尺度来关注对文化的传承，张开济先生“对盲目崇洋、追求表面上的现代化的行为不认可，对不适宜本国国情的浪费人力财力的行为不认可。”冯纪忠先生在旧住宅改建中也关注了尺度问题“新建部分应在建筑体量和空间尺度上与改造的部分连贯成一个整体”，等等。

总结一下，在“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下，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建筑语境中的“尺度”概念有所转换。政治主导时期社会整体都是对于人的尺度的忽视，但在住宅设计中，第二代建筑师通过超越街坊式的作品，使人的尺度具象。

改革开放后，建筑师既向内寻找，从

民居中汲取智慧；也向外寻找，如居住环境心理方法的进入。在此过程中，在对文化的探讨中也包含了对住宅设计的思考，即如何设计出不丢失本国文脉的新住宅。

这一社会环境迅速变化的时期中，语境的转变使“尺度”的概念不同，衡量建筑的“尺度”从是否符合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条件，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及大规模生产的要求，发展到之后内涵更丰富的探讨，其核心均是围绕“人”的价值展开。

学习张开济先生的学术观念，研读他的文章以及分析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从更拓展的角度去观察，关注第二代建筑师们在中国语境下的尺度和住宅设计理念。



图 12: 北京幸福村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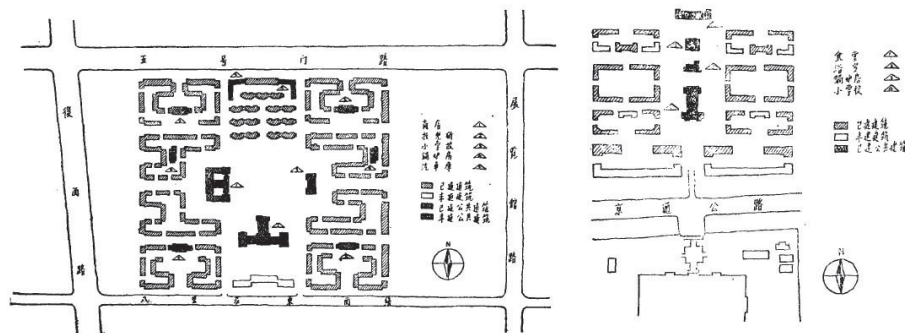


图 13: 百万庄住宅区总平面图

刘亦师：祝贺程老师从博士论文到出书，对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尤其是为1949年以后的建筑史领域的扩展，做了一项开辟性的工作，大功一件。

我具体讲两个例子，刚才叶依谦总也提到北京天文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我今年刚好作针对建筑技术的钢筋混凝土薄壳研究，学术界称作Z-D薄壳结构，北京天文馆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程老师在书里也提到了，北京天文馆的外观原型是参考学习了洛杉矶格里菲斯天文台（Griffith Observatory）。张开济先生后来又做了北京天文馆的扩建方案，在老馆两翼又各加了一个小穹顶，那就完全是格里菲斯天文台的样子。他在1957年发表的论文里，他不好直接说参考了美国洛杉矶的天文台原型，虽然从很多方面能够看得出来二者的关联。但是北京天文馆的场地更窄一些，和洛杉矶南边山还不太一样，所以北京天文馆的门厅和后面天象厅之间直接连在一起，而洛杉矶天文台的天象厅和门厅之间还有一个进厅，有个过渡空间。张开济在他的文章里谈道，我们的设计有一点点不好，也说不出哪不好，总觉得后面天象厅的大穹顶是坐在门厅上的（格里菲斯天文台的穹顶靠后且直临山崖，在入口处观望穹顶明显与门厅隔离开来），看起来不太合适，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改。这透露出一个信息，那个时候的张老在设计上似乎还不像后来做革命历史博物馆那样确定与自信，这个时候他在设计方法上有不少反思和质疑，值得玩味。此外，北京天文馆的室内是与美术家合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案例。

1958年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时候，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亦兰、冯钟平、张锦秋等先生都曾作为清华设计团队的成员参与过方案的竞赛和深化。我2018年去西安访谈张锦秋先生时提到此事，她说不要看清华的学生很能说会道，但到了真正要出图的时候，还是得跟着有经验的、在旧社会里跑过洋场的建筑师才能出活。正如杨廷宝先生说“什么都能来，中的也能来，西的也能来”，业主要什么他就能做

出什么设计来，像张开济、张镈那一代建筑师在1949年之前的商业社会里训练得比较全面，所以能够在国家需要他来做大规模建筑设计的时候出得上力。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最后的方案定案及其施工图是由张开济先生负责，他之前的专业训练是很齐备的，而他的设计手法及其思想来源既有中国传统的、也有西方古典的，并且有他自己的理解。

程力真：今天信息量非常大，我先回应一下马院士提出关于口述史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切中要害。我写这本书的基础资料主要有三部分：私人档案、北京院提供的工程图纸和干部档案。为什么没有做口述史方面研究呢？最主要是时间问题，因为上述这三部分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量已经非常大，目前书中呈现的也是其中一部分，没有将所有内容都纳入进来，包括叶依谦总提到的一些项目和图纸。在研究过程中，也曾经尝试去做一些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很遗憾的是书中项目直接涉及的人，基本都已去世。少数健在的老先生，因为年龄和健康的原因，需要通过家人的转述进行采访，效果不太理想。口述史获得的材料和档案、图纸不是一种类型，我看过李浩老师做口述史工作，先要采访很多人，然后对采访获得的信息进行细致的整理，由于口述史是非常鲜活的，很多史实要进行核对，所以有限的时间里面就没有做，这也是本书研究中的一个遗憾。我没有见过张开济先生，一方面这是个优点，彼此拉开了距离，但另一方面也是缺陷，就没有主观上对传主的认识。比如张开济先生是一个非常风趣和幽默的人，而我的行文比较刻板，后来为了修正这一点，在专家的建议下又补充了一些个人生活中的素材，希望呈现出一个更加全面生动的传主形象。

这一项研究工作除了令我对张开济先生本人有了深入了解，也让我对建筑师的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一直都说建筑师是带着枷锁跳舞的，在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以为张开济先生作为中国第二代建

筑师，应该是经历了枷锁最沉重的时期，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非常被动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他及同龄（同行）建筑师们，并没有甘于被枷锁禁锢，一直在努力追求他们心中的理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了我很多鼓舞。反过来会发现，建筑师这个职业进入中国还是很短的时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职业。现在由于市场的起落，行业内外对这个职业的未来都会产生一些质疑。我感觉大可不必过于悲观，从前辈们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确有很多用武之地，可塑性很高，当然每个建筑师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与具体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能力有很大关系。我想我们研究这些前代建筑师的经历，看到他们曾经在各个领域作出的拓展，可以为我们未来发展建筑师工作做出积极的参考。

李鸽：关于张开济先生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第二代建筑师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特殊的时代里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身份和定位。

前面多位学者的阐释，在我看来张开济先生在那个时代做的所有努力和尝试可能不是在寻找风格，而是在找方向。他的大方向就是在梁思成先生所提倡的“中而古，中而新，西而古，西而新”的四个象限中的“中而新”。

张开济先生执业71年，但他职业的历程不是非常的顺遂，可能那个特定时代下的建筑师都有点悲剧色彩的职业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短暂的职业生涯里，我认为张开济先生在“中而新”的道路上，最成功的尝试就是济南的西郊宾馆，他自己说这是一个“中而新”的作品。我想他所有的努力目标，包括“四部一会”建筑群、北京天文馆……从最开始就想好了方向，至于风格，中国建筑发展到那个时期，没有像西方建筑，有复古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吵和羁绊。张开济先生找到了“中而新”的方向，并一直在这条路上进行实践。

《建筑师张开济》这本书是目前能看到的，关于建筑师传记写的非常专业的，客观的学术出版物，它有两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首先，资料丰富，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有机缘获得这么多资料，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其次，写作方向把握得精准。程力真老师和张路峰老师在设计方面的分析和控制能力都很专业。同时，也用了史学家非常客观的历史视角去解读张开济的作品，视角专业、学术化，书里没有过高地评价和歌颂张开济的成就，但也没有忽略张开济先生所作的努力和创新，这是值得所有后面写建筑师的专著的作者们学习和借鉴的。

后续的研究可能就像马国馨院士和在座各位提出的问题，还可以有更多关于张开济先生学术上的一些资料的整理汇集，比如“四部一会”这么重要的建筑群，张老曾经经历过内心的痛苦煎熬，以及后来他也曾经为此写过好几篇文章，解释“四部一会”所经历的过程，这都是值得花时间去研究的内容，这可能不是一个人的人生，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我们《建筑师》杂志的创刊主编杨永生说得很客观，国家在那个时期“反浪费”是有道理的，在政治和艺术中间做选择时，必然要选择政治，艺术就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是有时代合理性的；但对于建筑师个人来说，可能是悲剧，这也是那一代建筑师的职业道路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的悲剧影子。相信后续会有更多的学者解开这些谜团，为大家解答第二代建筑师能够完成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身上背负了多少时代赋予他们的压力，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我从《建筑师张开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张开济先生既具有西方人本主义视角，又具有的中国传统的儒士精神。在专业上，他运用的是西方人本主义视角，“尊重历史，尊重环境，尊重文化”，这完全是一个建筑师宏观的人本主义视角。张开济先生热爱国家，有民族主义精神，他对建筑师最高的礼赞在纪念他的好朋友戴

念慈先生的文章里写到的——“忠于建筑，忠于人民”，说明他觉得建筑师最高级的品质就是“忠于建筑，忠于人民”，他写林乐义的文章里也提到“热爱建筑，热爱人民”。在内修上，第二代建筑师的情怀和儒士精神就体现在为谁工作，为谁做设计？对得起设计，对得起人民，才是张开济先生认可的最高标准和品格，这是建筑师的使命和追求，这是儒士精神。

张开济先生在求真这方面，有20个字让我特别感动。他说：“做人要天真，做事要认真，游玩要尽兴，工作要尽心”，让人不能不佩服，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很多的棱角没有磨平，但这是他自己对自己幸福人生的解读。值得我们去思考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去做建筑师，去成为一位好的建筑师，做好的建筑。

另：《建筑师张开济》一书序言的作者，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教授、建筑史学家赖德霖老师因为时差原因未能参加本次研讨，他特地手书了一副条幅委托主持人在现场呈现，以此表达他对张开济先生的敬意，他写道：

“值此张开济前辈诞辰11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向往同样理想的后学，我谨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衷心祝贺程力真博士的力作《建筑师张开济》问世，愿我们这个社会能有更多具有 common sense，并能在其所作所为之中更加忠实于 common sense 的人。”（图14）

（感谢刘川编辑协助整理文字）

注释

- ① 张开济. 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北民居冠中华 [C]. 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 (三),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 1-3.
- ② 同上.
- ③ 张开济. 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北民居冠中华 [C]. 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 (三),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 1-3.
- ④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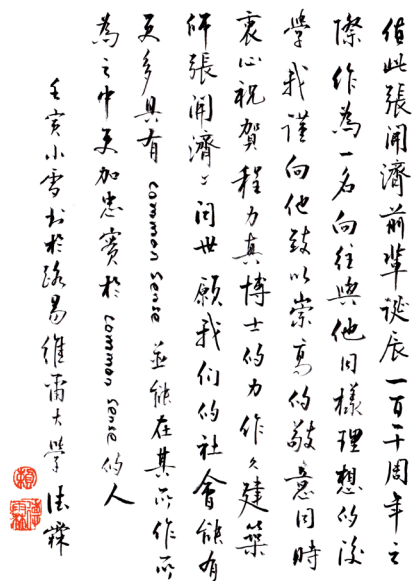


图14：赖德霖为缅怀与纪念张开济先生手书条幅

⑤ 同上。

⑥ 张开济等.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年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上领导和嘉宾的发言摘要 [J]. 建筑学报, 1993 (12): 4-7.

⑦ 张开济. 桂林山水甲天下 桂北民居冠中华 [C]. 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 (三),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 1-3.

⑧ 同上。

图片来源

图1：张开济家人提供

图2：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提供。

图3：中国建筑学会、城市建设部勘测设计局合编. 民用建筑设计图集第一集 [G]. 建筑工程出版社, 1958: 58.

图4：张开济家人提供

图5：单踊自绘

图6：张开济家人提供

图7：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提供

图8：钟训正先生收藏，单踊提供

图9：杨昌鸣拍摄

图10：张永和、范凌. 张博与张开济：对阵/分离——折射中国建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一段发展 [J]. 建筑学报, 2009 (01): 14-18.

图11：汪定曾. 上海曹杨新村住宅区的规划设计 [J]. 建筑学报, 1956 (02): 1-15.

图12：华揽洪. 北京幸福村街坊设计 [J]. 建筑学报, 1957 (03): 16-35.

图13：李宏铎. 百万庄住宅区和国棉一厂生活区调查 [J]. 建筑学报, 1956 (06): 19-28.

图14：赖德霖提供